

长久以来,由于汉代文献的春秋笔法,滇国历史多充满着蠡测与传说。直到“滇王之印”金印在石寨山墓地被发现,方才止息学者的争论。虽然金印证明了汉封滇国的史实,但它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结束时间仍不为人所知。在没有出土文献佐证的情况下,对待滇国止于何时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给出准确答案。幸运的是,近年河泊所遗址大量封泥和简牍文字的发现为这件悬而未决的事情迎来转机。“滇国相印”和“滇王相印”两枚封泥,作为“滇相”印章的使用后遗存,是滇国王廷权信运行的重要表征,对二者时代的辨析有助于探明汉封滇国的兴衰及相关史实。

“滇国相印”年代

“滇国相印”封泥出土于河泊所遗址2018年度发掘地点的灰坑H90。该地点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河泊所村东部,处于石寨山墓地与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之间。综合陶器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结果,H90的年代可确定为汉武帝至汉元帝年间(公元前140年~前42年),从考古埋藏学角度看,该时代范围是H90的使用和“滇国相印”封泥的废弃年代,结合元封二年始封滇国的记录,区间缩至公元前109年~前42年。

封泥呈方形,边长2.6、厚0.6~0.85厘米。上、下端边沿受限痕迹明显,平齐规整。右侧端略斜直,边缘有指印痕,可能经由手工修治;左侧端略向外突,边缘较为参差,近底处有4个绳孔。泥背较为平整,中部略圜凹,裸眼未见木纹痕迹,上方近边缘处有并列的两道绳索纹(图1)。该枚封泥与嵌入所谓“齿印式”封检后留下的特征基本一致。这类封检近年在上蒜一小地点出土过一件题署为“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的实物,盛行于武帝时期。因此我们推测,该封泥的使用年代大概率在元封二年后到后元二年(公元前109年~前87年)。

就印文风格而言,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3厘米。该尺寸与《汉旧仪》记载的武帝元狩四年诏令通官印方寸大相吻合。“滇国相印”四字小篆宽博方正,笔形平直,转折处略呈弧势,方中寓圆。笔画粗细均匀,表面平弧,说明印章极有可能是金属铸造而成。“相”字“木”旁下垂两笔与中竖平行,“目”部中间两横呈斜体;“印”字“爪”部三斜笔略带弧势,“卩”部末笔不见曳尾。这种风格和笔形笔势均与武帝时期所形成的定式基本相符。

武帝太初元年,曾对官印实施过一次规范性变革。《汉书·武帝纪》载:“夏五月,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注引张晏曰:“汉掘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若按此诏令颁布的时间计算,“滇国相印”为四字,是太初元年改制之前四字官印的通例,因而制作或颁发“滇国相印”的时间只能在元封二年至太初元年之间(公元前109年~前104年)。

但是,太初元年所改五字印,依张晏的解释有一个层级要求,即“诸卿及守相印”,也就是秩级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秩级相对较低的,如县和侯国官印,仍为四字。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在太初以后的整个汉代(除新莽时期)异常严格。根据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发现的西汉“蛮夷律”简牍所提供的信息——蛮夷君长划分等级的依据是二十等爵制,这样(汉·百官公卿表)“(诸侯王)相、丞相……秩皆二千石……(列侯国)相如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的规定也应适用于滇王。因此,如果我们欲知“滇国相印”是不是太初印制改革的潜在对象,就需要确认“滇相”的秩级,但“滇相”的秩级却又由滇王的地位或滇国的等级直接决定。

20世纪50年代,随着“滇王之印”金印的发现,学者对这枚印章的来源、制作和颁发年代等进行了较多讨论,目前基本形成统一意见。即西汉时期由中央政府所赐。然而就如何安排滇王在历史语境中的位置,日本学者曾有较多讨论。总结起来,观点主要分作两种:一是滇王兼有内臣和外臣双重身份;二是滇王更具内臣属性。从现有发现看,我们更支持滇王为内臣的观点,因为汉王朝除了对滇王封爵赐印,还在滇国设置“相”和“丞”等职官,这与其他诸侯国的官僚系统无异,直接受中央王朝统治,因而武帝所封之滇王属内臣无疑。

滇王既是内臣,那么滇国是比同“王国”还是“侯国”,这是确认“滇相”秩级的关键所在。我们分别将滇国与王国和属国加以比较,并从书写习惯与印文格式讨论这个问题。与王国相比,滇国寄于益州郡内,显然不同于与郡并行、统辖诸县的王国。对比其他异族附后设置的属国,属国施行流官与土长并行的双轨制,前者包括属国都尉、属国侯、属国丞、属国骑千人等职官;后者按“归义/率众王”“归义/率众侯”“归义/率众君”“任长和佰长”等爵级安排外族官,属国在级别上与郡同级。滇国可能直接受益州郡管理,亦可能由中央直辖。作为外族官,滇王不见“归义/率众”字样,益州郡和滇王以下职官完全是中央王朝复制核心统治区行政架构的结果。就目前所知,汉代整个滇池盆地及周围被滇池、谷昌、建伶、连然和俞元等县所分割和包围,滇国王都同郡治滇池县比邻而居,所以我们尚不能确定汉代滇王是否仍有所领之地,或许仅保有复长其民之权责和滇王名号之尊崇。

汉代王国和侯国名称,有一字与两字之差,一字王国有如代、梁,二字如胶东、长沙;一字侯国如鲁、张,二字如丹阳、新蔡。从目前著录的汉代国相印章和封泥考察,无论四字还是五字,王国相皆不书“国”字,例如“代相之印”和“梁相之印章”;与之相反,侯国相则全部带有“侯”字,如“营侯相印”和“女阴侯相”。“滇国相印”明显不同于王国相印的书写习惯,而与侯国的做法更为接近。此外,从所掌握的“广侯相印”“平侯相印”“营侯相印”“襄侯相印”和“蒙侯相印”几枚一字侯国相封泥的书写格式看,它们的统一书写顺序都是侯国名+侯+相印,这种格式与“滇国相印”如出一辙。

综上,我们认为滇王虽属内臣,但滇国的地位明显低于王国与属国。即便有国之名号,但滇国与益州郡的隶属关系、职官构成和官印书写习惯与格式都与侯国无异,所以“滇相”的秩级达不到二千石,从而“滇国相印”不在太初元年五字印改革之列。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武断地将“滇国相印”制作和颁发时间精确在元封二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9年~前104年)这5年间,而以元封二年后到后元二年(公元前109年~前87年)较为稳妥。

“滇王相印”年代

“滇王相印”封泥出土于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该遗址点为厘

『滇国相印』和『滇王相印』封泥年代考释

张瑜
蔡丹阳



图1 “滇国相印”封泥



图2 “滇王相印”封泥



图3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1)和湖南长沙五一广场(2、3)出土的方槽式封检



图4 摹印“王”字的印章和封泥

定益州郡郡治的位置和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两汉时期,大部分遗存属于东汉。

封泥总体呈方形,印面上端右侧一角虽残缺,但仍可见四侧边沿受阻痕迹,该特征与“滇国相印”封泥嵌入的封检不同,它是纳入四面有木挡的方槽式封检。右侧边沿正中残留一小块向外突出的印泥(图2),与之类似,如“北海相印章”“山桑侯相”以及“滇王相印”出于同一地点的“连然长印”和“朱虞之印”等官私印封泥都存在此项特征,这可能与方槽式封检左右挡板中部预留的横向绳槽有关。此种封检在新疆民丰尼雅和湖南长沙五一广场等遗址均可见到实物(图3)。印槽式封检首创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到东汉,以至于魏晋,一直是简牍最主要的封检方式。结合该遗址点纪年简牍确定的书写范围(公元前83年~公元130年)和遗迹HJ4的测年数据(公元10年~公元204年),暂定这枚封泥的使用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四年到东汉末。

封泥印面呈正方形,“滇王相印”四字匀落整齐,字体更趋方正;笔画方折,以直势为主,表面有棱状凸脊,暗示印文经凿刻而成。“相”字“目”旁,中间两画平行;“滇”“印”两字与“滇国相印”大体雷同,惟方折笔势与之区别明显;“王”字三横笔近乎等距,此特征完全不同于西汉时期中横靠上的摹印“王”字,如“淄川王玺”“滇王之印”“淮阳王玺”和“城阳王印”等。东汉初期“王”字中横虽有下移趋势,但上中横画间距仍略小于中下横画间距,如“朔宁王太后玺”和“广陵王玺”等。到了东汉中期至魏晋,“王”字中横画才较为稳定地居于中位,如“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和“晋归义胡王”等(图4)。“滇王相印”封泥的印文书风,特别是“王”字,强烈显示出时代较晚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测,“滇王相印”的制作年代当在东汉中期,即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到东汉末年。

结语

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通夜郎,置犍为郡,到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内属,开永昌郡,汉王朝在西南夷这一广袤地区开疆拓土并推行统治规范的努力长达200余年。在此期间,汉帝国中央册封了众多异族王侯,如夜郎王、夜郎侯、鉅町王、鉅町侯、漏卧侯和哀牢王等,他们后来或被贬或遭诛杀。与之相比,作为西南夷大国君长之一的滇王从未有所谓反叛被诛贬之记录。“滇国相印”和“滇王相印”封泥足可证明,汉封滇国从武帝元封二年始,至少维持到东汉中期,下限可能到汉王朝覆灭。《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曰:“汉诛西南夷,国多灾矣,唯滇复为宠王。”司马迁的评论不仅反映了武帝时期滇的特殊地位,一语成谶,与汉王朝良好的关系使其国祚绵长。究其根本原因,这极有可能与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政策的连续性和巩固关中的战略有关。相信随着河泊所出土文献的不断释读,终会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AKZU

让文物活起来,
好灯光会说话!

博物馆
展览高标准
照明就用
埃克苏

深圳市埃克苏照明系统有限公司
博物馆和美术馆专业照明产品及解决方案
400-687-2598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高峰期,尤其在东汉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型镜式,“青盖”铭铜镜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有关青盖镜的著录始见于北宋王黼所著的《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山左金石志》《金石索》《铜仙传》《奇觚室吉金文述》等文献亦有记载,并形成“青盖”铭文为工匠名的传统认识。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多年来,随着铜镜出土资料和相关论著的增多,国内外学者对“青盖”铭的释读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第一,“青盖”为人名;第二,“青盖”为商号名;第三,“青盖”是喻铜镜为天盖;第四,“青盖”铭属于“尚方”铭系统。本文主要以第四种观点为依据,系统梳理和分析东汉时期青盖镜的纹饰演变与文化寓意。

青盖镜纹饰类型

目前,出土东汉青盖镜的地点有21处,共22面,馆藏地点17处,共19面;另外,在铜镜研究著作与金石著录中记载东汉青盖镜共63面,但均未记载出土地与馆藏点。上述青盖镜已排除出土地点、馆藏地点和论著收录等重复出现情况,总计105面,主要选取属科学出土者、图片与信息清晰、齐整者72面以作纹饰考释。

东汉青盖镜龙虎纹类48面,包括龙虎交合纹与龙虎对峙纹;龙虎交合纹铜镜内区高浮雕一龙一虎、双龙双虎或二龙一虎,龙虎纹尾部相交(图1-1)。龙虎对峙纹分别有一龙一虎纹、二龙一虎纹、龙虎纹、瑞兽纹、羽人纹,内区饰高浮雕龙虎绕钮相对(图1-2)。乳钉纹类20面,内区乳钉分别有四乳、五乳、六乳、七乳、八乳等类型,内区除乳钉纹外还饰有高浮雕龙虎、羽人、鹿以及鸟兽纹带,鸟兽纹带以四神兽纹为主,瑞兽纹为鹿、羊、鱼等(图1-3、图1-4)。方格纹类2面,其典型特征为方格纹饰。镜面主体布局以方格纹为框架,其间饰有四神兽、羽人及各类瑞兽纹饰,方格内部铸刻有铭文。外缘区域则装饰有直线纹和画纹带,画纹带内部以云纹或变形夔纹为主(图1-4)。神兽纹类2面,内区以钮为中心,环列青龙、玄武、凤鸟、仙鹤、飞鸟、蛇、鱼等高浮雕图案(图1-5)。

综上,东汉时期青盖镜的装饰纹样主要包含以下几种典型组合:

- (1)龙与虎的纹样组合。
- (2)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神兽的纹样组合。
- (3)以龙虎纹样为核心,辅以羽人、鸟、鹿、蛇、羊、鱼、龟、独角兽、双角兽等多样化的辅助纹样组合。
- (4)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神兽纹样为主体,配以羽人、鸟、鹿、蛇、羊、鱼、龟、独角兽等不同组合的鸟兽纹带。

在装饰纹样方面,东汉青盖镜的主体纹饰经历了从浅浮雕到高浮雕的演变,展现出较强的立体感。主要纹饰以四象神兽、一龙一虎、一龙二虎、一龙三虎、二龙一虎、双龙双虎、四虎等为核心,辅以羽人、鸟、鹿、蛇、羊、鱼、龟、独角兽、双角兽等多样化的辅助纹样(图2)。

青盖镜的纹饰演变

东汉早期 这一时期乳钉纹镜和龙虎纹镜较为流行,而神兽纹镜则相对较少。在乳钉纹类中以七乳钉纹镜为主,主题纹饰主要源自四神兽纹的演变。主纹有两种形式:其一,钮座外九枚乳钉环绕,或为素纹带,内区乳钉间饰四神兽和瑞兽纹,形成鸟兽纹带;其二,钮座外龙虎绕钮相对,再外为鸟兽纹带。神兽纹类以四神兽纹为主,或另饰以瑞兽纹。龙虎纹类主要为龙虎对峙型和龙虎、瑞兽型。龙虎对峙型主纹为一龙一虎和二龙一虎,龙虎绕钮相对,部分身躯压于钮下,称为盘龙,无瑞兽纹。龙虎、瑞兽型主纹为一龙一虎绕钮相对,加饰羽人、鸟、羊、鹿等不同组合的瑞兽纹。

东汉中期 这一时期乳钉纹类内区主纹主要为鸟兽纹带,双周乳钉纹居多。四神兽纹已消失。龙虎纹类出现龙虎交合型,主纹仅为一龙一虎绕钮相对,龙虎尾部相交。龙虎对峙型较早期变化不大,主纹仍仅为一龙一虎、二龙一虎。龙虎、瑞兽型主纹为一龙一虎,仍存在羽人纹,出现蛇纹。

东汉晚期 这一时期青盖镜数量减少,乳钉纹镜和龙虎纹镜较为流行,新出现方格纹镜,四方格神兽镜形制同世代或在东汉晚期。晚期方格纹青盖镜主纹以方格间饰四神兽、龙虎与各瑞兽纹,内区饰不同的画纹带。这两面青盖镜在形制、纹饰、铭文以及规格大小等方面极为相似,因此五方格龙虎镜应同为东汉晚期制品。乳钉纹镜消失,神兽纹镜自中期消失后再次出现。龙虎纹类中内区对峙型主纹仍为一龙一虎和二龙一虎;内区增加了瑞兽纹;画纹带占据铜镜外区;龙虎、瑞兽型主纹为一龙一虎,龙虎交合型和羽人纹饰消失。

东汉『青盖』铭铜镜纹饰考究

罗寻
夏保国

东汉青盖镜的发展演变显示,除龙虎对峙型主纹由简至繁外,其他类型的发展演变皆为由繁至简。东汉早期青盖镜以龙虎纹为主体,加饰四神兽纹和其他瑞兽纹,而四神兽纹在此类镜上成为“辅纹”,东汉中期、晚期仍存在此类纹饰布局。内区仅饰四神兽纹的铜镜只出现于东汉晚期,而以龙虎纹为主题纹饰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的青盖镜上。

综上所述,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铜镜纹饰主题以四神兽为主,各种形态的禽鸟、瑞兽成为铜镜的主要装饰元素。此类纹饰组合在东汉时期的乳钉纹类青盖镜中较为普遍,呈现出以主纹环绕镜钮进行分区布局的新趋势。在早期双周乳钉纹镜的内区,尚存素纹带,而到了晚期,逐渐被四神兽、瑞兽纹等图案所取代。方格纹镜和仅铭有“青盖”二字的铜镜均无铭文带,铭文铸于内区,极大地丰富了铜镜的图案内容。

青盖镜纹饰寓意分析

龙虎纹 龙、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象征,常被赋予吉祥、辟邪的寓意。在青盖镜中,龙虎纹与瑞兽纹的组合,不仅丰富了镜面的装饰效果,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不同亚型的龙虎纹类铜镜,在纹饰布局、铭文内容及制作工艺上均有所差异,这反映了东汉时期铜镜制作的地域特色与时代风格。如龙虎交合纹通过龙虎尾部的相交设计,展现了和谐共生的理念;而龙虎对峙纹则通过龙虎绕钮相对的布局,营造出一种紧张而富有张力的视觉效果。龙虎纹青盖镜不仅展现了东汉时期铜镜制作的精湛技艺,还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龙虎等瑞兽的崇拜与信仰。

乳钉纹 乳钉纹类的青盖镜,从四乳到八乳的变化,不仅展现了青盖镜在乳钉数量上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东汉时期铜镜制作工艺的精湛与细致。此外,乳钉纹类的青盖镜在分区布局上也体现了东汉时期铜镜制作的高超技艺。内区、中区、外区的不同纹饰和布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方格纹 方格纹类的青盖镜,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独特的纹饰布局和铭文内容,依然展现了东汉时期铜镜制作的独特风格。方格与神兽、羽人及瑞兽纹的巧妙结合,不仅丰富了镜面的视觉效果,也增添了铜镜的文化内涵。方格内的铭文,或记录着铸造信息,或寄托着美好寓意。外区的直线纹和画纹带,简洁而不失庄重,与内区的繁复纹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突显了方格纹类青盖镜在布局上的匠心独运。画纹带内的云纹或变形夔纹,飘逸灵动,仿佛将观者带入了那个神秘而遥远的东汉时代。

神兽纹 神兽纹类的铜镜,不仅展现了东汉时期铜镜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也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崇拜和神话传说的热爱。四神兽的组合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方位和季节的认知,也寄托了他们对宇宙和谐、万物共生的理想追求。值得注意的是,神兽纹中除了传统的四神兽外,还增添了瑞兽如仙鹤、飞鸟、蛇、鱼等图案,这些瑞兽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常被赋予吉祥、长寿的象征意义。

结语

东汉时期,由“青盖”民坊铸造的铭文铜镜,其特征与“尚方”官坊生产的铜镜高度相似,显示出模仿官坊的明显迹象。青盖镜的纹饰可细分为龙虎纹、乳钉纹、方格纹及神兽纹等四类,而铭文则包括纪年、“青盖”“大毋伤”“自有纪”“四夷服”及其他六类。青盖镜内区主要装饰有四神兽纹、高浮雕龙虎纹以及其他瑞兽纹相间分布组合而成的鸟兽纹带。中区一般由铭文带和直线纹各一周构成,铭文多为七言诗或四言诗,内容涉及国家安定、风调雨顺、富贵长寿、辟邪祈福以及升仙等主题。此外,画纹带伴随着浮雕式图案的发展而出现,具体纹饰各异,取代了外区的锯齿纹、波折纹、云纹等;画纹带装饰有四神兽、龙虎纹、羽人及各瑞兽纹相间组合分布,亦有饰花纹和夔纹。东汉青盖镜的发展历程,最初以四神兽纹为主,或以此为基础,配以羽人、鸟、鹿、蛇、羊、鱼、龟、独角兽、双角兽等不同组合纹饰;随后逐渐以高浮雕龙虎纹为中心,或以龙虎纹为主体,结合上述纹饰进行多样化组合;至东汉晚期,又出现了仅饰四神兽纹的青盖镜。从东汉早期至中期,青盖镜的主题纹饰呈现出从浅浮雕向高浮雕演变的过程,其纹饰题材与早期道家观念紧密相关,映射出东汉时期的人文思想。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23BKG015)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MicroWise
— system —

元智系统

应用场景:

博物馆、遗址区、考古发掘现场、图书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旅游景区.....

智慧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馆藏设施、文物展柜、文物运输监测、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咨询服务.....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联系人: 张总13572270596
座机: 029-88346362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 www.microwise-system.com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图1 青盖镜纹饰类型

图2 青盖镜纹饰组合